

# 深度贫困的再生产逻辑及综合性治理\*

张明皓 豆书龙

**【摘要】** 深度贫困成为精准扶贫的坚中之坚是由深度贫困的性质定位与精准扶贫的政治和伦理功能所决定的。群体和个体双重转化所引致的“贫困再生产”的层次互移、时间和空间弱势累积所形塑的“生存性均衡”的自我维持、结构与行动内向互构所产生的“经济性贫困陷阱”的持续卷入构成深度贫困的再生产逻辑和社会后果。深度贫困的破解需要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发挥,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是以“超时空强制”和“超市场强制”为表现形式,而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合法性则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体制优势。回归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治理本源,深度贫困的消除为贫困治理形态向综合性转变提供了契机。综合性治理框架以公共价值、制度结构以及扶贫内容的综合为必要构成,其正显示出消解深度贫困的真正潜力。

**【关键词】** 深度贫困;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综合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 (2018) 04-0044-07

## 一、深度贫困:缘何成为精准扶贫的坚中之坚?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工作被置于中国政府的“一线工作”,并历经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1993)、“八七”扶贫攻坚(1994—2000)、集中连片和整村推进(2001—)和精准扶贫(2013—)四个主要阶段。<sup>[1]</sup>而扶贫瞄准也相应经历了农村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等四个单元。<sup>[2]</sup>多元递次型的扶贫开发战略也因此具备提升社会整体发展质量的功能。精准扶贫作为融合科层制和项目制的贫困治理形式,以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分级运作模式推进贫困治理单元下移,目的是以精细化的发展干预实现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的根除。<sup>[3]</sup>深度贫困在本质上仍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其具有内涵和空间上的规限性即“两高”(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一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一差”(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三重”(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sup>[4]</sup>并广泛匹配于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劣势的空间地域,具体而言,深度贫困地区是指“三区三州”即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sup>[5]</sup>因此,深度贫困具有相对于绝对贫困更为底线的特性。深度贫困具

有绝对贫困的基本属性,其可以被标识为个人或家庭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生命延续受到威胁的状态。<sup>[6]</sup>但深度贫困也具有内涵的特殊性(见表1)。首先,从深度贫困的形成规模来说,深度贫困概念的外延不仅局限于个体或家庭的分散性贫困,同时也与群体性和规模性的福利缺失状态相关,具有整体和部分的二重性,因此具有最大的贫困治理难度。其次,从深度贫困形成的时空条件来说,其具有时间和空间弱势累积的多重限定,特定的时空结构致使深度贫困成为嵌入当地生活世界的“生存性均衡”。再次,从深度贫困的致因来说,在结构界面,不平衡的发展结构以及相对封闭的区域性交换系统成为贫困结构固化的重要缘由,而在行动界面,自我发展伦理和生计资本转换行动的弱化构成贫困生成的微观原因,而深度贫困同时兼具“结构”和“行动”致因的互构属性,二者相互强化致使深度贫困群体不断卷入“经济性贫困陷阱”。

表1 深度贫困的表现特征与社会结果

	表现特征	社会结果
形成规模	兼具群体和个人的福利缺失状态	贫困治理难度的最大化
时空条件	时间和空间弱势累积的多重性	嵌入当地生活世界的“生存性均衡”
生成原因	贫困结构固化和自我发展行动弱化的互构	持续卷入“经济性贫困陷阱”

\*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农业科技扶贫的减贫机理与政策研究”(编号:DXBZKQN 2016004)  
作者:张明皓,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豆书龙,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3

作为多维度贫困的长期沉淀,深度贫困之所以成为当前精准扶贫的“坚中之坚”,这分别由深度贫困的性质定位以及精准扶贫的政治和伦理功能所限定。一方面,“绝对贫困”作为精准扶贫即将终结的历史范畴,“深度贫困”则相应构成“绝对贫困”的关键部分,攻克“深度贫困”具有消除“绝对贫困”的全局功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伦理精神的活动,本身具有满足贫困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实现主体性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精准扶贫的政治化则再次赋予脱贫以历史性的标志意义,通过政府动员型的资源管理与人事调配使精准扶贫成为当前改造中国农村发展结构广泛而深刻的实践。

综合来说,深度贫困之所以作为精准扶贫的“硬仗”是由深度贫困的性质和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而社会主义的制度关怀和伦理关怀则赋予终结深度贫困和精准扶贫的合法性来源。深度贫困的形成不仅遵循一般贫困的发生规律,同时也具备自身再生产的独特逻辑,而阻断深度贫困的再生产逻辑则需再次调适精准扶贫的模式结构,并以释放“超常之力”发挥反贫功能。<sup>[7]</sup>本文以深度贫困再生产的逻辑展示为分析基础,据此论证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表现方式及合法性。同时,以回归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治理本源为基点,进而延伸关于深度贫困综合性治理的分析讨论。

## 二、深度贫困的再生产逻辑:层次互移、生存均衡与贫困陷阱

深度贫困可自我复制并持续以动态变化的方式保存贫困秩序的连续性,因此深度贫困具有再生产特性。深度贫困的再生产具有多面性,其关涉人口规模、时空结构和具体行动等一系列方面。本文以关系化视角呈现深度贫困再生产的机制逻辑,并相应分析不同深度贫困再生产逻辑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 (一)群体和个体的双重转化:“贫困再生产”的层次互移

深度贫困的形成规模具有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深度贫困与分散性的个体绝对贫困状态不同,其同时表现为群体性和规模性的福利缺失状态。个体深度贫困的加成构成群体性深度贫困的总和,而深度贫困的群体性和规模性也构成个体深度贫困生成的主导因素。从个体角度来说,个体深度贫困的生成逻辑以人力资本匮乏与基本可行能力剥夺为分析进路,阿马蒂亚·森认为缺失“人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构成功能性福利实现的障碍,<sup>[8]</sup>而人力资本的匮乏则被归因于贫穷者的劣势基因、成就需求缺失和固有的身心疾病等,而由此影响深度贫困个体生计资本存量的增进。<sup>[9]</sup>而个体深度贫困与强脆弱性具有伴生关系,深度贫困的个人或家庭由于遭遇各种风险而极易导致财富损失和生活质量严重下降。<sup>[10]</sup>人力资本的匮乏和可行能力的弱化直接规制

个体生计资本动员和生存压力转化的能力,从而影响个体深度贫困的绝对消除。从群体性的角度来说,与一般地区相比,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分化程度低,群体之间福利缺失的差异较小。深度贫困呈现出自我复制和自我扩散的特征,群体深度贫困既相当于个体深度贫困的总量加成,又因积聚贫困强度和贫困广度而具备整体性的结构特征。群体深度贫困因其“整体”的结构情景而对作为“部分”的个体深度贫困生成和强化具有支配性作用。可见,深度贫困在个体和群体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层次互移,不同规模单位均持续维系并再生产出贫困秩序的稳固性,而群体性和个体性深度贫困的双重转化和贫困再生产的层次互移决定精准扶贫应以二元推进的模式改造深度贫困生成的社会基础。

### (二)时间与空间的弱势累积:“生存性均衡”的自我维持

深度贫困再生产的层次互移标明深度贫困形成的规模条件,而时间和空间的弱势累积则相应构成深度贫困再生产的另一属性。首先,从时间属性来说,“弱势累积”是先赋性弱势因素诸如时代特征、地域环境、家庭关系、健康状况等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发挥作用的<sup>[11]</sup>先赋弱势因素间的综合作用不断锁入深度贫困个体或家庭的生命周期历程之中发挥影响,当遭遇负向性生命事件如疾病、灾害、事故等时,极易形成先赋性弱势和负向生命事件相互强化的“双高型弱势累积”(先赋性弱势程度高、负向生命事件影响因子高),<sup>[12]</sup>从而不断加深家庭或个体的长期贫困境况。深度贫困作为长期贫困的积淀,是家庭和个体长期经历贫困并虽经扶助也难以脱贫的状态。<sup>[13]</sup>因此,深度贫困具备极强的自我再生机制,陷入深度贫困的个体或家庭无法摆脱深度贫困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迭进性影响,个体或家庭生计压力转化的能动性被极大化抑制。同时,深度贫困随时间推移而形塑的累积型弱势也相应内化贫困代际再生产的内容,从而不间断地制约贫困群体的生计资产增量和可行能力的代际传递。其次,从空间属性来说,深度贫困空间集中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深度贫困时间的弱势累积具有和空间弱势累积的内在匹配性。地理因素在深度贫困的再生产逻辑中具有重要地位。深度贫困的生成同时受限于“第一地理因素”和“第二地理因素”的双重强制,“第一地理因素”包括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生态条件等,而“第二地理因素”包括社会文化距离、地方经济竞争以及地区收入再分配差距等。<sup>[14]</sup>地理“二因素”的相互结合致使深度贫困地区陷入“空间贫困陷阱”。“空间贫困陷阱”是地理资本存量低、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区,而大量实证研究证实“空间贫困陷阱”分布于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恶劣、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深度贫困区域。<sup>[15]</sup>深度贫困空间的弱势累积不仅影响深度贫困个体生计资本重构能力的提



升,而且不断强化区域性整体生计系统转化结构的限制性。最后结果是,深度贫困弱势累积的时空结构持续形塑出合宜深度贫困地区“生存性均衡”的物质生产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从物质生产结构来说,深度贫困地区“生存性均衡”体系是对舒尔茨传统农业社会均衡理论的复刻,舒尔茨认为,传统社会因为技术状况保持不变、持有和获得收入来源的偏好和动机状况保持不变而保持均衡的状态。在低物质供给的结构性情境下,深度贫困群体虽然进行资源的有效利用但仍然停滞落后,<sup>[16]</sup>而从文化价值系统来说,Lewis以特定时空脉络形成的“贫困文化”说明穷人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与主流文化的区隔化,以此论证作为“亚文化”的“贫困文化”统摄和规范贫困群体行为动机和生活情境的功能。<sup>[17]</sup>而在未强烈接触现代伦理以及自致性文化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文化”具有“生活者”视角的合理性,是“最适”地方时空情境的规范性取向,这种规范性取向同时被具体化为有限资源重复性运用以及适应自然而行动的“地方性知识”,<sup>[18]</sup>而在行动者控制的范围内,行动者受其规范和价值观所支配,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影响着建立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或手段的选择。<sup>[19]</sup>在“贫困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规范性价值体系的支配下,深度贫困群体所形构出的是有机体与环境互相内化但低物质供给的行动策略和生活方式。“生存性均衡”物质生产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的互嵌性决定深度贫困再生产逻辑具有顽固性。

### (三) 结构与行动的内在互构:“经济性贫困陷阱”的持续卷入

深度贫困再生产的层次互移以及时空弱势累积结构所形塑的“生存性均衡”都在指涉深度贫困再生产的逻辑表征,而深度贫困再生产的根本逻辑则在单位规模以及时空范围下逐渐突出,这一逻辑可由“结构”和“行动”的互构视角来说明。

基于多维贫困“结构—行动”互构分析框架,深度贫困个体或群体的生计资本转化过程以不同的交换行动(自然交换、市场交换、社会交换)为载体嵌入到区域交换系统(自然交换子系统、市场交换子系统、社会交换子系统),而生计资本转化受区域交换系统制约并不断建构区域交换系统。<sup>[20]</sup>首先,从“结构”对“行动”的作用过程来说,在深度贫困不同的区域交换系统中,自然交换子系统具有低生产力的结构性障碍,市场交换子系统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结构性障碍,社会交换子系统存在宏观社会资本匮乏的结构性障碍,三类子系统间的“断裂”与结构性障碍制约深度贫困群体的生计资本转化效率、市场产业培育以及集体行动能力;<sup>[21]</sup>其次,从“行动”向“结构”的转化过程来说,深度贫困个体或群体的交换行为分别嵌入至区域交换系统中的自然交换子系统、市场交换子系统以及社会交换子系统中释放生计资本和生计压力的转化功能。但

深度贫困个体或群体面临强生计风险且生计资本组合能力薄弱,深度贫困个体或群体的生计资本转换行动形成的是“资源流动封闭”的发展结构。<sup>[22]</sup>而“结构”(限制性的区域性交换系统)与“行动”(无效性的生计转化行动)的关联互构则因深度贫困群体无法实施有效的交换活动而持续卷入“经济性贫困陷阱”。纳克斯认为,在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普遍偏低,人们的绝大多数收入用来消费,导致储蓄水平低下和资本形成不充分,从而又导致收入水平低下。低收入意味欠发达地区消费能力弱,导致生产水平低,人均收入不足,因此产生恶性循环,并形成长期存在并难以突破的贫困陷阱。<sup>[23]</sup>循此逻辑,深度贫困的重要特征是贫困人口的收入长期处于只能支付基本生存的水平并受“生存性均衡”的物质生产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所规限,深度贫困群体无法将生存性资源转化为生产性资产,而绝大多数的资源收益则被外部市场消费所耗散。<sup>[24]</sup>因此,精准扶贫应以高强度的收入增长机制创造跨越“经济性贫困陷阱”的条件。

综上所述,深度贫困再生产的逻辑表征分别以单位规模和时空条件作为中介变量,而以“结构”与“行动”致因的内在互构作为深度贫困再生产的根本逻辑。规模单位和时空条件作为中介变量的“一阶结果”分别导致“贫困再生产”的层次互移和“生存性均衡”的自我维持,而深度贫困结构与行动致因的内向互构藉由中介条件和“一阶结果”的转化和扩散,产生更为根本的“二阶后果”即持续卷入“经济性贫困陷阱”。深度贫困再生产逻辑和后果可由图1进行结构化说明。

### 三、“超时空强制”与“超市场强制”:精准扶贫如何释放超常之力?

针对深度贫困结构的多面性和顽固性,精准扶贫需重新组合内容和形式以释放“超常之力”消除深度贫困。而精准扶贫的超常规功能具体以“超时空强制”和“超市场强制”为具体表现方式,其不同于精准扶贫常规功能的特点在于扶贫策略的强介入与综合性两个方面。

#### (一)“超时空强制”:区域性交换系统的抽离与结构再造

深度贫困具有时空弱势的累积性。深度贫困群体和个体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双高型弱势累积”以及由于地理“二因素”所形构的“空间性贫困陷阱”都为深度贫困的消解设定了刚性限制条件。同时,贫困文化的价值系统与低物质供给的结构性情境的统一性造就“生存性均衡”的静态生活方式。区域性交换系统的结构性障碍再生出的资源流动的封闭结构无法促使深度贫困群体的生计过程实现与自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交换,而“经济性贫困陷阱”的顽固存在也决定在特定时空结构下很难消除深度贫困再生产的影响,因此,在精准扶贫中应以“抽离”相对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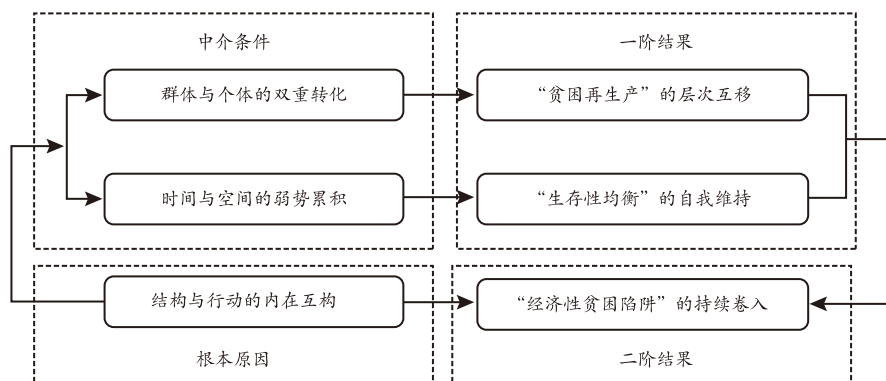


图1 深度贫困再生产的运作机制和社会后果

闭和稳态化的区域性交换系统的“超时空强制”方式实现深度贫困的破解。在精准扶贫的内容中,其中一项是以“异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的切实举措。异地扶贫搬迁所集中的空间广泛密布于地理资本存量低的深度贫困地区,异地扶贫搬迁的具体方式遵循“超时空强制”的基本逻辑,即以抽离当地社会时空的方式实现贫困移民与新型社会结构的“再嵌入”。异地扶贫搬迁“超时空强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将原有的深度贫困群体抽离固有的时空结构而放任自流,而是在“抽离”的同时实现深度贫困群体物质文化结构的再造。因深度贫困的结构生成具有稳态均衡的低物质供给结构与贫困文化价值结构的内在统一性,由此“结构”再造应同时实现物质形态结构与文化价值结构的二元推进。在精准扶贫的异地扶贫搬迁中,“超时空强制”的具体化路径催动深度贫困地区原有的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生存性均衡”的物质生产逻辑被打破,低物质供给的结构性情境被替代性重组。而在深度贫困群体物质结构再造的同时,贫困文化的价值系统因其相对独立性和与社会基础的内融性,因此具有最大化的改造难度。因此,精准扶贫中贫困群体的意识能力建设应作为异地扶贫搬迁后续的补充性措施。同时,在“超时空强制”的异地扶贫搬迁中,对于因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累积型弱势而彻底丧失可行能力以及生计资本转化能力的深度贫困群体来说,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兜底则具有维护底线权利的社会功能。为保证物质文化结构再造的连续性与平滑性,当前异地扶贫搬迁的“超时空强制”方式应利用现有的村镇实现灵活的城镇化,并依托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保证深度贫困移民群体的包容性发展,对深度贫困移民群体的社会福利应以超越户籍属地主义的方式实施整合的异地普惠型社会保障。<sup>[25]</sup>因此,深度贫困“结构”的再造以“抽离”固有的区域性交换系统的时空属性为基础,以连续性与平和性为组织原则,在异地扶贫搬迁的主线中突出意识能力建设与社会政策针对性以推动深度贫困群体再造新型社会时空结构与发展结构,从而提升深度贫困地区社会治理的效能。

(二)“超市场强制”:共有性生产服务的输出与市场再造

深度贫困相对封闭的区域性交换系统使其无法接续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市场伦理,深度贫困群体由生存性资源变为生产性资产的动力和途径不足。因此,在深度贫困地区以自由市场规律为运作原则的“产业扶贫”尚不具有自洽性,且强行植入产业经营极易导致“水土不服”。在精准扶贫“超时空强制”的基础上,以政府主导型的资源配给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再造市场生成条件的准备性功能。在中国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语境中,“超市场强制”是指政府对直接生产者利用非市场规则诸如政治、法律等力量输出生产资料以启动市场化运作。在“超市场强制”的第一阶段,政府应以共有性的生产服务直接配置以营造深度贫困社区的市场化条件。因深度贫困具有群体性,普及群体层面的公共物品应成为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而非竞争性公共物品如教育、医疗、购物、道路等设施建设和示范具有松动与现代化市场伦理距离的功能。而第二阶段的目的则是“再造”和“回归”市场,政府应积极利用已建立的公共物品基础性平台,藉由有计划的发展干预引导深度贫困群体自愿将生存性资源转变为生产性资产,并鼓励其参与小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消费性活动,而由市场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应由政府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政府应积极利用深度贫困社区自有的生态资源,牵引“高端消费市场”,探索将深度贫困群体家户所共有的原生态农产品销往城市市场,并利用深度贫困地区原有的自然资源和民居改建开发高品质的旅游和会议服务,<sup>[26]</sup>以此创造跨越“经济性贫困陷阱”的高收入增长条件。可见,精准扶贫先期的“超市场强制”是以后期回归市场再造为目的,而在扶贫过程中应避免直接采用剥夺物质生产资料的强制商品化和过度产业化的方式扩大贫富差距并造成村社共同体的瓦解,而精准扶贫应坚守共有性原则即在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提供以及深度贫困群体所共有资源的利用协作方面建立普惠持续的财富收入流。



(三)“超常之力”的合法性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体制优势

“超时空强制”与“超市场强制”分别对精准扶贫“超常之力”的时空作用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作出界定性说明。但公共政治结构和公共价值结构最终赋予体制运作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是指政府实行统治和使用权力的正当性或道德性,<sup>[27]</sup>而精准扶贫“超常之力”的运作机制和功能实现的合法性则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体制优势。其一,从理论合法性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任务,而扶贫则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过渡性手段。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生成、扩张、膨胀的内在机制和增长规律的作用,使社会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之间形成一种财富失衡增长的怪圈,因此,马克思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配不均的财富增长机制甚至消灭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复归财富均衡增长和终结贫困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向“完整的人”的过渡。<sup>[28]</sup>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语境下,将贫困群体从自然和社会支配的“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为贫困群体的自由发展提供准备性条件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体制的必然要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体制具有理论合法性。其二,从历史合法性来说,改革开放后,扶贫工作被置于越来越高的位置,历经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八七”扶贫攻坚、集中连片和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四个相对递进的主要阶段,而扶贫体制一直保存稳定的历史连续性并不断进行内部调适,从而有效推进扶贫工作的深化,而精准扶贫则将终结绝对贫困作为基本的历史任务。其三,从实践合法性来说,我国扶贫成就巨大,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4335万人,中国农村的贫困状态已有大幅度改观,<sup>[29]</sup>贫困群体得以享受扶贫的制度收益并充满对制度价值的道德预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体制具有体现“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合法性。

综上所述,根除深度贫困需要释放精准扶贫的超常规功能,“超时空强制”和“超市场强制”作为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体现,在“抽离”深度贫困区域性的交换系统与政府强制“输出”生产服务的背后,其目标是实现“结构”和“市场”的再造。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将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无论是局部性或暂时性的)与地域的时一空条件相契合。”<sup>[30]</sup>因此,“脱嵌”的目的实则是“再嵌”,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表现形式的目标同样是“再嵌”或“再造”深度贫困地区的物质文化结构和资源要素市场。但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实现的合法性最终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体制优势。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体制所固有的理论合法性、历

史合法性以及实践合法性才得以保证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运行与社会基础的自洽性。

#### 四、综合性治理:回归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治理本源

精准扶贫以国家资源的社会化注入与政治干预的方式再次调整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精准扶贫在实质上是治理问题。“治理”本质上是指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根据一定规则在互动场域中对公共性资源配置并对基本秩序进行重构的过程。<sup>[31]</sup>由此,在精准扶贫中始终内含贫困治理主体、贫困治理规则以及贫困治理资源的交错作用。从精准扶贫的体制逻辑来说,在项目制分级治理的框架中,精准扶贫以国家部门的“发包”机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机制以及村庄的“抓包”机制构建出不同行动逻辑互动和资源利益补偿的制度性公共平台,<sup>[32]</sup>但精准扶贫中也存在扶贫资源碎片化以及组织部门权能分割的执行困境。<sup>[33]</sup>而从精准扶贫的运作内容来说,“五个一批”体现出五个方面的“事本主义”即生产经营、教育、生态补偿、社会保障、异地搬迁不同方面的内容,而五项脱贫攻坚内容间尚不具有完全的兼容性。从精准扶贫的价值结构来说,精准扶贫所固有的政治合法性决定政府需要将体现“人民性”意识形态要求的制度环境纳入自身行动体系,同时为增进扶贫资源管理绩效,公共财政投入效用的最大化也相应成为政府面临的技术环境。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均宣示出公共性价值,但在精准扶贫所追求的意识形态认受性与公共财政投入效用最大化的“公共性”之间往往存在嫌隙,实际存在的情况是对精准扶贫效用最大化的强调让位于社会合法性的追求。<sup>[34]</sup>深度贫困的消除既是精准扶贫的政治化任务,同时也构成精准扶贫模式调适的“试验场”,深度贫困的存在决定精准扶贫应以超常规功能的释放为基础性条件,而回归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治理本源,精准扶贫的内部调适正显示出贫困治理形态综合性转变的趋势。据此,以“价值—制度—内容”三者联动的分析结构为基础,以此延伸关于深度贫困综合性治理的讨论。

从公共价值综合的角度来说,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所针对的深度贫困治理,一方面,精准扶贫可集合深度贫困群体对扶贫政策和项目的价值期望,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的发挥体现出“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认受性。另一方面,兼具顽固性和再生产特性的深度贫困倒逼精准扶贫高效率 and 精细化资源配置技术环境的确立,而深度贫困作为绝对贫困的“重点”又使公共财政投入具有相对清晰的瞄准靶向。因此,消除深度贫困为实施从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到再分配各环节的全面质量管理创造了契机。在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运作的背景下,适时建立消除深度贫困的“资源清单”和“权力清单”可成为构建精细化政府的先期准备。可见,深度贫困作为贫困治理的“试验场”,具备使贫困治理形

态向两种公共价值即意识形态合法性和公共财政投入效用最大化综合的趋势,而政府也应坚守公共价值引导的负责行政理念为贫困治理形态的综合性转化创造有利条件。

从制度结构综合角度来说,跨层级整合、公私部门结合以及不同功能聚合构成深度贫困综合性治理的体制结构基础。一方面,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表现为异地扶贫搬迁的“超时空强制”即通过抽离原有的区域性交换系统实现深度贫困物质文化结构的再造,这要求跨区域和跨层级行政权力在深度贫困移民安置以及异地社会保障整合等方面实施统筹配置。另一方面,精准扶贫超常规功能表现为“超市场强制”即政府通过生产服务的强制输入以启动深度贫困社区的市场化条件。市场具有不同的层级和标准化结构,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各级政府应根据市场层级的异质性进行相互衔接的生产服务配置。同时,行政权力应进行社会赋权以激活多元的扶贫主体和生产服务主体,以此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要素市场的逐步培育。另外,扶贫多部门的权能合作、扩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开发式扶贫政策两项制度衔接的惠及范围并实现扶贫具体政策与区域性发展战略和城乡融合宏观政策的协同推进相应构成深度贫困综合性治理的制度整合基础。

从扶贫内容综合角度来说,首先,深度贫困的再生产表现为“贫困再生产”的层次互移,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福利缺失状态决定兼顾公共性和个体性的综合性治理计划设计的必要性。政府通过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配给以及对接个体的社会保障资源可以兼顾深度贫困个体性和公共性的扶贫要求。其次,深度贫困时空的累积型弱势因内化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负向影响与代际贫困再生产的内容,因此,建立综合学前儿童抚育到教育扶贫等全方位的治理方案成为深度贫困治理克服弱势累积的关键内容。而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空间性贫困陷阱”,推动生态补偿以及异地搬迁两项扶贫内容相衔接,可在极大程度上抵消深度贫困地区地理资本存量不足的消极影响。另外,在深度贫困群体共有性资源利用协作的基础上开发相关产业并再造市场,可为深度贫困社区创造跨越“经济性贫困陷阱”新的增长点。因此,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教育、社会保障、生产经营、生态补偿以及异地扶贫搬迁五项内容相互联动,以此构成深度贫困综合性治理的内容基础。

深度贫困既是贫困治理的“难题”,也为贫困治理形态的综合性转化提供了契机,综合性治理正展现出消解深度贫困的真正潜力。从各地的深度贫困治理实践来说,扶贫管理体制整合、扶贫政策“组合拳”、项目资源统筹和项目布局优先配置、“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营建等创新性实践已经凸显综合性治理的关键内涵,而进一步的实践重点在于继续总结各地深度贫困

治理的创新经验并深化研究,以此推进深度贫困综合性治理体制的系统化。①

#### [参考文献]

- [1]张琦,冯丹萌.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1978—2016年[J].改革,2016(4).
- [2]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
- [3]王宇,李博,左停.精准扶贫的理论导向与实践逻辑——基于精细社会理论的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6(5).
- [4]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831/c1024-29507971.html>.
-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7-11/21/content\\_5241334.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7-11/21/content_5241334.htm).
- [6]王朝明,申晓梅.中国21世纪城市反贫困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6.
- [7]郭民民,赵建军.以超常之力攻克深度贫困[N].山西日报,2017-06-21.
- [8][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3.
- [9]江涛.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
- [10]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26.
- [11]胡薇.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J].社会,2009(2).
- [12]张翠娥,王杰.弱势的累积: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 [13]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71.
- [14]罗庆,李小建.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进展[J].经济地理,2014(6).
- [15]Bird, K., Shepherd, A. Livelihoods and Chronic Poverty in Semiarid Zimbabwe. *World Development*, 2003(3).
- [16][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1.
- [17]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1966(4).
- [18]罗意.地方性知识及其反思——当代西方生态人类学的新视野[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 [19][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等

-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48-50.
- [20] 李雪萍, 王蒙.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3).
- [21] 李雪萍, 王蒙.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下的生计脆弱——基于武陵山区的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5).
- [22]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 新经济社会学: 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M]. 姚伟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59.
- [23] [美] 拉格纳·纳克斯. 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M]. 谨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6.6.
- [24] 李小云. 把深度性贫困的治理作为精准扶贫的重中之重[EB/OL]. [http://theory.gmw.cn/2017-04/24/content\\_24284434.htm](http://theory.gmw.cn/2017-04/24/content_24284434.htm).
- [25] 王晓毅. 移民的流动性与贫困治理[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 [26] 李小云. 贫困走向“终结”, 如何应对“新贫困”时代?[EB/OL]. [http://www.sohu.com/a/152759505\\_481285?](http://www.sohu.com/a/152759505_481285?_f=index_societynews_6)
- [27] 姚大志. 善治与合法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5(1).
- [28] 阮瑶, 张瑞敏.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经济伦理特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实现[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 [29] 人民网. 1400万人仍处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是集中地带[EB/OL]. <http://rmfp.people.com.cn/n1/2017/1124/c406725-29666850.html>.
- [30]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69.
- [31] 狄金华. 被困的治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4.
- [32] 折晓叶, 陈婴婴.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4).
- [33] 樊友凯, 周里.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精准扶贫体系优化研究[J]. 学术月刊, 2017(5).
- [34] 陈成文, 吴军民. 从“内卷化”困境看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政策调整[J]. 甘肃社会科学, 2017(2). (责任编辑 熊洋)

### The Reproduction Logic and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Deep Poverty

Zhang Minghao Dou Shulong

[ **Abstract** ] Deep poverty is the backbone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functions of the deep poverty and th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ogic of the deep poverty is the poor reproduction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e “living balanced” shaped by the weak accumul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poverty trap” pro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needs unconventional function to break the deep pover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unconventional function is deriv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t system advantage. To return to the source of the unconventional fun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limination of deep povert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poverty governance.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which is necessar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valu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cont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s showing the real potential to eliminate the deep poverty.

[ **Keywords** ] deep poverty,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unconventional function,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 **Authors** ] Zhang Minghao is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ou Shulong is Ph.D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